



P. Mattheus Ricci S.J.

Fundador da Primeira Congregação de Nossa Senhora na China

利瑪竇在南京

賓 靜*

耶穌會士在華的實質性活動是以意大利耶穌會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1543-1607）和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於1582年入華為其肇端的。尤其是利瑪竇，把羅耀拉（Ignacio Loyola, 1491-1556）“適應當地習俗”的策略思想真正付諸實踐：讀華書、講華語、着華服、行華禮、奉華俗……。利瑪竇在華傳教二十八年，足跡遍及大江南北。雖然其間他在南京停留的時間並不長，但是，儘管“自從北京成為帝國的行政首都以來，南京的政治地位下降，但仍然是文化中心，歷史和傳說的故土，文明教化之鄉，高人雅士、達官貴人慣常居住之地。”^{（1）}這畢竟不是他以往所住過的城市如肇慶、韶州等地所能相比的。利瑪竇自己也清楚地認識到：“我們若要識得中國的文化、禮儀等等盛況，必須捨棄帝國的外皮，深入其核心、內臟。”^{（2）}正因為此，利瑪竇首次進入中國的核心城市南京的活動以及南京對其傳教策略的影響就值得探討。

三次南京之行

離開廣東後，利瑪竇共三次進入南京。第一次是1595年（明萬曆二十三年）5月31日至6月16日。這年4月，北京兵部侍郎石星大人（以後為兵部尚書）由原籍返回北京，為治其子病，同意帶利瑪竇北上，他們於5月31日抵達應天府（南京）。在南京，利瑪竇遇見了總督劉繼文的兒子劉五。劉繼文曾把利瑪竇趕出肇慶城，但他的兒子卻熱心地幫助利瑪竇，安排他在南京城中居住下來。但時隔數日，利瑪竇便遭到南京工部侍郎徐大任的驅逐。徐大任原任廣東參議，在韶州曾與利瑪竇交遊，並曾打算帶他到南京，但此時徐卻以外國人居住南京會引起民變為由，逼迫利瑪竇離開這座城市，甚至派人警告利瑪竇的房東，不准把房子租借給外國人居住。6月16日，利瑪竇走投無路，祇得返回南昌。此行匆匆顯得倉促，但利瑪竇卻因能親眼瀏覽“留都”山水，頗“沾沾自喜”，自覺“不負此遊”，對南京風光贊不絕口：

在中國人看來，論秀麗和雄偉，這座城市

超過世上所有其他的城市，而且在這方面，確實或許很少有其他城市可以與它匹敵或勝過它。它真的到處都是殿、廟、塔、橋，歐洲簡直沒有能超過這些的類似建築。在某些方面，它超過我們的歐洲城市。這裡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稠密的人口包括各個階層，有黎庶，有懂文化的貴族和官吏。後一類在人數上和尊貴上可以與北京的媲美，但因皇帝不在這裡駐蹕，所以當地的官員仍被認為不能與京城的相等。然而在整個中國及鄰近各邦，南京被算作第一座城市。^{（3）}

第二次是1598年（明萬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瑪竇離開南昌，攜郭居靜隨王忠銘首次晉京，途中經過南京。抵達南京後，利瑪竇結交了總督趙可懷。當時由於中朝戰爭因戰事失敗又重新開戰，戰爭氣氛重新籠罩全國，且官方明文規定，不得窩藏任何服裝形跡可疑的人，南京市民沒人敢讓利瑪竇一行留宿。利瑪竇等人祇好躲在小船裡，必要時才坐轎子去見王忠銘。有一次，利瑪竇被豐城侯李環的僚屬抓住，在查明他是禮部尚書的朋友後

* 賓靜，廣州暨南大學歷史系碩士研究生。

才被放走。8月底，利瑪竇沿運河北上，祇是此次北京之行並未獲得成功。

第三次是1599年（明萬曆二十七年）2月至1600年5月。利瑪竇在知府王應麟府邸過完大年後，乘王知府的官船去南京，並於2月6日從挨近大運河的一道城門步行進入南京城，寄寓承恩寺。2月10日，他在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府邸歡度元宵節。此後，南京國公、五軍提督、太監頭等競相邀請作客。經多人挽留後，利瑪竇放棄最初要去蘇州傳教的想法，決定落腳南京。至1600年5月北上之前，利瑪竇在南京居住的時間達一年有餘。

在南京的活動

利瑪竇雖然在南京的時間前後祇有一年半左右，但從史料記載可看到，他在這一年半時間裡的活動可以說是豐富多彩的。

一、利瑪竇在南京廣交文友

三次入南京，利瑪竇都曾廣泛結交中國士大夫，包括上層官員、有名學者、王公貴族等。早在廣東時利瑪竇就以其學識和展示隨身的鐘錶、三稜鏡等新奇物品開始與中國士大夫接觸。初到南京，利瑪竇就認識到“此城一度是全國的都城和幾百年來古代帝王的駐蹕地，儘管皇帝由於前面提到的理由已遷都北方的北京，南京仍然沒有失掉它的雄壯和名聲。即或是失掉了，那一事實也僅祇證明它從前比現在更加了不起。”⁽⁴⁾如此，利瑪竇當然清楚這座城市的地位與以往他曾居住過的城市大不相同，可以在此地更進一步地融入中國社會，為社會名流所接受，這對傳教來說當然是個極大的機遇。

利瑪竇在南京交遊的人物大致有三類。其中一類是各級官員。在南京，利瑪竇認識的主要官員有趙可懷、王弘誨、馮保等。

趙可懷，舉萬曆進士，歷刑部主事，在利瑪竇第二次進入南京時為應天巡撫。他對利瑪竇的〈山輿地圖〉非常欣賞，當他聽說“地圖的真正作者正路過南京，正擬前往北京，趙大人立即差遣長隨領車轎往謁，無論如何也得把這樣的一位異邦俊傑接來”⁽⁵⁾；而這時，利瑪竇一行已經準備次日起航繼續北上。但是，“尚書勸他們不要拒絕總督的邀請，神父們的意見也是不應放棄結識一個非常有權

威的高官的機會”⁽⁶⁾。這樣，利瑪竇停留下來結識這位高官。趙可懷對利瑪竇的數學及歐洲情況介紹極感興趣，並讓當地最顯要的人士來瞻仰利瑪竇的〈救世主像〉，使得利瑪竇得以結識日後在北京對神父們幫助甚大的秦□新（Cinzncin的譯音？）。最後，趙可懷不僅“給了他一大筆銀子，對他北上之行是非常有用的。”而且，對於神父的北上，“毫不猶豫地給予十分寶貴的忠告”。⁽⁷⁾

王弘誨（1542-？），字少傅，號忠銘，歷官南京禮部尚書致仕。他不僅親自帶利瑪竇等人第二次經過南京，甚至在利氏第三次進入南京時提供各種方便和保護。“他很願意神父住在附近，以便保護他。還沒有等到答覆，他就把他府中的兩個熟悉南京情況的官員找來，吩咐他們到外面租一座適合神父需要的房子”⁽⁸⁾，還在利瑪竇去拜會他時給予“聞所未聞的禮遇，一開始就提高了他的聲望”⁽⁹⁾，為利瑪竇結識南京各級官員打開了方便之門。

馮保，太監總管，時任守備，兼有各種職務，不僅管理京城內的幾千名太監，還管京城各城門的收稅差事，並與李環一起安排各種軍事操閱。有了他的熱情接待，以及南京城內另幾位高官的支持，足夠保證利瑪竇神父的安全了。⁽¹⁰⁾

利瑪竇與這幾位官員的交往大大提高了他的身份和聲譽，贏得了一批又一批高朋好友。與其交往的南京各部名宦中還有刑部尚書趙參魯、刑部侍郎王樵、刑部主事吳中明和南戶部尚書張孟男、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國子監祭酒郭明龍、翰林院編修楊荊巖、工部員外郎劉冠南等。他們經常來拜訪利瑪竇，贈送豐厚的禮物，提供種種幫助。“他們大家的意見都是利瑪竇神父應當居住在南京，他們都答應幫他找房子。自此以後他就在城內自由來往並訪問官府，無人詰問。”⁽¹¹⁾王忠銘還把“郭祖乾（Guozuchien的譯音？）字明倫和翰林楊子剛（Iamchigan的譯音？）帶去見他。”⁽¹²⁾這兩人和葉向高以後均昇遷至北京任官，為利瑪竇日後在京城的活動奠定了方便的基礎。

南京是明代人文薈萃之地，學者名流雲集之都，學術界人物是與利瑪竇交遊的第二種人，如祝世祿、王肯堂、焦閔、李贄、徐光啟、李心齋、李本固等。

祝世祿（1539-1610），字延之，號無功，鄱陽人，萬曆間進士，泰州學派理學名儒，當時身兼要職。他對利瑪竇的學術十分欣賞，後來也正是由於他的大力幫助，利瑪竇才得以順利地二次晉京。

王肯堂，字宇泰，號順庵，以博學多聞著稱於世。他對中國數學作了長期的研究，想創立一種新的方法，最終卻無功而返。他十分欣賞利瑪竇的數學和天文知識，甚至讓他的學生帶着他親筆寫就的推薦信，拜利瑪竇為師。他誠懇地請求利瑪竇說，收他的學生為學生也就是收他本人為學生。後來，王肯堂主編《鬱風齋筆塵》，把利瑪竇著作《交友論》、《二十五箴言》稍加刪潤收入書中，書中還記載利瑪竇傳入的西方天文、數學、造紙知識，如太陽大於地球，地球大於月球，等等。⁽¹³⁾

焦閔（1541-1620），字弱侯，號澹園，江寧人。李贄（1527-1602），亦名載贄，字宏甫、思齋，號卓吾、溫陵居士、百泉居士，晉江人。兩人是至交好友，都十分推崇利瑪竇。李贄是明代進步思想家，是一個與世執拗，忤逆儒教的叛逆者，人們對他與利瑪竇親密往來都感到“莫大驚訝”。1599年（萬曆二十七年），李贄與翰林修撰焦閔同至南京。不肯輕易謁見達官顯貴的李贄，這一次不惜紆尊枉駕，親自登門拜訪利瑪竇。出於敬意，李贄送給利瑪竇兩把扇子，並親筆題詩贈送給利西泰。⁽¹⁴⁾李贄對天主教信仰緘口不言，但對利瑪竇個人的學術和為人大加稱贊。他贊揚利瑪竇“住南海肇慶幾二十載，凡我國書籍無不讀，請先輩與訂音釋，請明於《四書》性理者解其大義，又請明於《六經》疏義者通其解說，今盡能言我此間之言，作此間之文字，行此間之禮儀，是一極標致人也。中極玲瓏，外極樸實，數十人群聚喧雜，讎對各得，傍不得以其間門之使亂。我所見人未有其比，非過亢則過諂，非露聰明則太悶悶瞶瞶者，皆讓之矣。”但是，李贄也指出“但不知到此何為，我已經三度相會，畢竟不知到此何幹也。意其欲以所學易吾周、孔之學，則又太愚，恐非是爾。”云云。⁽¹⁵⁾

徐光啟（1562-1633），字子夫，號玄扈。他因為參加科舉考試，路過南京，聽說那兒來了個歐洲傳教士利瑪竇經常講些西方的科學知識，於是在1600年經郭居靜神父的介紹與利瑪竇會面。首次會

面，他們暢談了幾晚，觸及一些極其重要的問題，例如對死亡的看法等。在談話過程中，利瑪竇認識到徐光啟是位學識過人的學者，而徐光啟也開始對西方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南京是明朝開國都城，居住許多公侯顯貴。公侯顯貴就成為利瑪竇在南京交遊的第三種人，如魏國公徐弘基、豐城侯李環等。魏國公徐弘基是徐達的第十代後裔，他對利瑪竇帶來的歐洲珍玩很感興趣，並曾邀請利瑪竇一起宴飲。利瑪竇第二次到南京時，豐城侯李環曾派兵逮捕利瑪竇。後來，他得知利瑪竇是王弘誨的朋友，深感歉意，兩人因而成為朋友。

通過與士大夫的交遊，利瑪竇逐漸意識到南京較蘇州更有利於傳教事業，於是放棄原先在蘇州開教的計劃而定居南京。雖然利瑪竇在此前也結交了一些士大夫，然而“瞿太素祇是一介秀才，王應麟祇是鎮江知府，即使徐國槐也祇是本省制臺，設治於句容以避免最高當局之鋒，他們對比起南京官高爵顯者來，祇是無名小卒。”⁽¹⁶⁾認識南京的這些高官名士，不僅為自己在南京傳教提供了保障，更為日後進北京打下了基礎。

二、利瑪竇在留都參與各項文化活動

利瑪竇認識了那些士大夫之後，被稱為“西儒”的他，自然不可避免的參與了各項士大夫名人的文化活動，從而更深入地瞭解中國文化。

首先是參加祭孔預演活動。作為王弘誨的客人，利瑪竇被邀請出席祭孔活動的預演會，“他與王的兒子們和他的隨從們並坐在前排，聽到了由道士、官方音樂家所組成的樂隊的演奏。”雖然利瑪竇“並不欣賞中國樂隊的音樂”⁽¹⁷⁾，但他看到了宏偉的天壇，“任何別處也不如這裡把古代中國的威嚴巍峨表現得如此淋漓盡致。利瑪竇所獲印象對他關於中國宗教的解釋打下了深刻的烙印”⁽¹⁸⁾。在目睹了儒家的傳統儀式後，利瑪竇更深層次地領會到了儒家在中國的地位。

其次，編寫《二十五箴言》。1599年8月15日以後，利瑪竇開始着手編寫《二十五箴言》。在此之前，他曾嚐試從會院書籍中找出一些西洋格言或哲人的名句，加以修飾而編寫了一本《交友論》，以適合中國士人的心理需求。撰寫這本為他和歐洲人爭光的書，他認識到編寫此類書比他“所做的其他

事件要大；因為其他科學之類的書籍祇介紹西方的科技或藝術，而這本書則介紹修養、智慧與文學，因此許多人非常喜歡這本書。……〔它〕在兩處由別人印刷過，甚受學者的喜愛。”⁽¹⁹⁾在南京編寫的這本《二十五箴言》，同樣也受到了南京學者的喜愛，王肯堂就說：“利君又貽余近言一編，若淺近，而其旨深遠矣，亦錄數條置之座右。”⁽²⁰⁾《二十五箴言》“成為他最大的文學成就之一”⁽²¹⁾。

對於宗教問題，利瑪竇在南京進行了幾場辯論，其中以與和尚三槐（又作三淮、三懷，即雪浪大師黃洪恩）的辯論影響最大。篤信佛教的文人李本固常詆毀儒家學說，他聽說利瑪竇居然欽佩孔子，很不以為然，想親自見見這位洋人。在他的安排下，利瑪竇與金陵鼎鼎大名的三槐進行了幾場辯論。⁽²²⁾這一論學問道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整個南京城。利瑪竇在此間表現出的才智學問讓大家對他更加景仰，就連李本固的學生之中也有許多來向他請教。利瑪竇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萬物的由來，申論天主是造物的主宰。後來，他把和李本固學生答問的內容記下，編成一篇文章作為《天主實義》的一部分。這場辯論結束後，學者們得出結論：“他們原先以為是蠻夷之道的，實際上並不如他們所想象的那麼野蠻。”⁽²³⁾利瑪竇終於在士大夫中為基督之道打開了方便之門。

利瑪竇參觀南京雞鳴山北極閣天文臺，教授西方科學。利瑪竇第一次看到了由郭守敬製作的精美而測量準確的中國前代天文儀器，如渾天儀、量天尺等，第一次接觸中國天文學組織機構，瞭解明末中國天文學發展狀況的實情，逐步改變了原先對中國天文學的評價。“靠他的學生們的幫助，利瑪竇神父製造了各種樣式的日晷，分給了他們。隨後，他又從模子裡鑄了許多座，放在各個官員的家裡。除去這些外，他還製造了標明昐天體的天球儀和標明整個地球表面的地球儀以及其他科學儀器。”⁽²⁴⁾在向觀象官員們解釋清楚自己不是來和他們爭官職後，雙方開始互相拜會。於是，在利瑪竇指出那些天文儀器的用法和缺點後，張養墨等主動拜他為師，向他學習數學和天文知識。

利瑪竇同時還教授歐几里德的數學（由瞿太素譯成中文），而他的弟子錢揚謀“自動盡可能廣泛

閱讀之後，回去向恩主 Guansciungan 稟告，王翰林就命人把利瑪竇所講科學與倫理學刊印了許多部”。當“他知道神父想把偶像崇拜教打開一個缺口，便建議他不要直接論戰，說道：‘單憑您的數學，便可使他們關於自然現象大肆散佈的那些荒謬絕倫的謊言信譽掃地。’”⁽²⁵⁾

重修《輿地全圖》。1600年利瑪竇遇到南京吏部主使吳中明。吳中明“要求利瑪竇神父修訂一下他原來在廣東省所繪製的世界輿圖，給它增加一些更詳盡的註釋。他說他想要一份掛在他的官邸，並放在一個地方供公眾觀賞。”利瑪竇高興地接受了這一要求，開始大規模修訂肇慶版世界地圖，重新取名為“山海輿地全圖”。“這副修訂的輿圖在精工細作上和印行數量上都遠遠超過原來廣東的那個製品。它的樣本從南京發行到中國其他各地，到澳門甚至到日本，他們還說各地都印有其他各種複〔副〕本。”⁽²⁶⁾

利瑪竇還經常散發來自歐洲或在日本複製的版畫和繪畫。據說，“中國人對那些有插圖的書總是驚愕不置，他們以為是雕塑，不相信那是繪畫”⁽²⁷⁾，對這些西洋畫大加贊揚，如稱其天主像“乃女人抱一嬰兒，眉目衣紋如明鏡涵影，蹣蹣欲動，其端嚴娟秀，中國畫工無由措手乎”⁽²⁸⁾。通過這些努力，利瑪竇靠他的學識和舉辦展覽吸引了一些科學家和眾多的百姓，進一步擴大了自己的影響。

三、利瑪竇在南京建立居留地，展出寶物，宣揚教義，為新教徒受洗。

在南京，在那些士大夫們的勸說下，利瑪竇決定尋找適當的房子，建立居留地。1599年5月，工部員外郎劉冠南將工部一幢鬧鬼的房子低價售給利瑪竇，使得利神父如願以償。

定居以後，神父們就不失時機地展示預備向皇上進貢的物品，以吸引眾人的注意，擴大自己的影響。“大家都急於看到利瑪竇帶來的自鳴鐘。它們以鐘聲報時特別吸引人。關於塑像，特別是關於八音琴的傳述，不僅是被誇大了，而且幾乎是荒唐的。”⁽²⁹⁾而來參觀這些奇器的“大多數是平民百姓，受陳列物的吸引，一湧而至，‘瘋了似的’。名流顯貴繼續來的也仍然很多：其中不少是來請教數學或倫理科學……”⁽³⁰⁾蜂擁而至的南京百姓高度

贊美西方文化藝術。後來，因為參觀人數日益增多，教會房子擠得水泄不通，展覽無法繼續下去，利瑪竇祇得停展。

在參觀欣賞之際，利瑪竇也乘機向觀眾講授西洋的學術。前往聽講的人逐漸增多。在講學或與人談話時，他還常常涉及西洋風土人情，宣揚基督教義，介紹歐洲，解說醫院、孤兒院等情況，殊重指出基督教仁愛的美德和實行美德的種種方法，直接介紹基督教的教義。就是如此基督教教義慢慢地在與中國士大夫的交接來往中傳佈開去，慢慢地引起南京市民對天主教的興趣，於是有些讀書人開始信從

了，終於有了皈依者。南京的皈依者中最突出的是一位七十多歲的秦姓本地人（教名馬丁），是個貴族，他的兒子是南京的都指揮。他入教後不久，全家男女以及一些親戚都先後受了洗。他甚至於“為換取一幅精美的救世主像，馬丁後來交出了一大筐偶像，送至澳門作為‘南京首戰告捷的戰利品’”⁽³¹⁾。

利瑪竇在南京的活動對傳教事業的影響

利瑪竇在南京活動的時間並不長，但取得了顯著成績。1599年8月14日，利瑪竇在一封信中不無自豪地說：“我們在這裡也甚得朝野人士的好感，且



利瑪竇1601年繪製的〈坤輿萬國全圖〉（局部）

可說今年獲得雙倍的收穫，因為能在這裡建立會院，將來如在另處再成立會院也比較容易。”⁽³²⁾利瑪竇的努力收穫甚大，先後取得了上層官員的保護，士大夫的支援，百姓的信任，不僅為在南京傳教奠定了基礎，也為在其他城市傳教開拓了道路。

不僅如此，利瑪竇在南京的活動，還對其在華傳教策略的最終形成產生了重要影響。首先，在南京的活動使利瑪竇更加“適應當地的習俗”，更深入地接觸中國文化，尤其是熟悉中國內地文人學士的習性，瞭解了如何在士大夫和百姓中間傳播影響，得到朝野士大夫們的悉心幫助和多方聲援。他不僅深入士大夫階層，觀看儒教儀式，還明白了“培養對基督教世界的友好態度的另一種方法，就是在神父們所寫的一切東西上都習慣加上一些簡短的道德箴言。有些箴言是用他們本國文字寫成的，然後再用中文來解釋。中國人喜歡這個習慣，往往收集這些警句，寫在自己的扇子，或抄在紙上，從而可以貼在牆上閱讀。”⁽³³⁾在瞭解到如何利用儒家學說之後，他更加肯定地堅持走與中國士大夫階層相結合的傳教道路。

利瑪竇充份發揮西洋科學和奇器在傳教過程中的作用，認為“為求完備起見，在南京，也應像在肇慶、韶州、南昌那樣提到精確科學的種種應用。就這樣，通過交談、筆寫，也通過日時計以及其他各種奇巧之物，基督教學說日益滲透南京的智識階層，福音酵母開始作用於異教群眾。”⁽³⁴⁾通過展出進貢之物，利瑪竇等認識到：這些油畫像、印刷品、三稜鏡等“在意大利不值幾文，但在中國可謂價值連城，我們可以當禮品呈獻給中國皇帝或要人。”⁽³⁵⁾因此，利瑪竇在北上之前就曾“毫不延擱，立即把新近運來的小禮物分贈可能有助於自己的人仕，謀求照顧。”⁽³⁶⁾

利瑪竇認識到雖然“我們的教會甚受朝野人士的重視，有些人還視我們為‘偉大的聖賢’，從遙遠的地方神奇地來到中國，但並非所有中國人都知道很多，有些人深知我們的意願，但並非人人都願冒危險積極地給我們幫忙。”而且“中國人不喜歡外國人”，“假如我們聚集許多教友在一起祈禱開會，將會引起朝廷或官吏的猜忌。因此為安全

計，應慢慢來，逐漸同中國社會交往，消除他們對我們的疑心，而後再說大批歸化之事。”⁽³⁷⁾

通過在南京與高官顯貴和名人文士的接觸，利瑪竇更加明白：在中國傳教必須“先得皇帝的批准是最要緊的，以免遭到猜疑有被驅逐出境之虞”⁽³⁸⁾。這些對於利瑪竇在南京和以後堅持去北京傳教都有深遠影響，使他更加堅定了北上進京的信心：“來年一定要再去北京，爭取向萬曆進貢。”⁽³⁹⁾

總言，利瑪竇在南京停留的時間雖然不長，但是在各方面的傳教活動已經開展並取得初步成效。通過在南京的實踐活動，他加深了對中國社會和文化傳統的認識，促成了他在華傳教路線和策略的最後形成。所以，不論就傳教活動的開展，還是就傳教路線的形成而言，利瑪竇在南京的活動都構成天主教耶穌會在華傳播史上的一個重要時期。

【註】

- (1)(2)(5)(7)(9)(12)(16)(18)(21)(22)(25)(27)(30)(31)(34)(36)(39) (法)裴化行：《利瑪竇神父傳》，商務印書館1998年中譯本，頁187；頁211-212；頁243-244；頁244-245；頁259；頁261；頁257；頁267；頁294；頁281-284；頁274；頁294；頁289；頁304-305；頁294-295；頁308；頁288。
- (3)(4)(6)(8)(10)(11)(23)(24)(26)(29)(33) (意)利瑪竇、(比)金尼閣：《利瑪竇中國遊記》，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頁201；頁202；頁227；頁241；頁252；頁241；頁260；頁248；頁250；頁240；頁268。
- (13)(20) (明)王肯堂：《鬱岡齋筆塵》，《續修四庫全書》子部雜家類1130，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頁86、87、82-85、135；頁87。
- (14) (明)李贄：《焚書》（下），中華書局1974年，頁67〈贈利西泰〉“逍遙下北溟，迢遞向南征。利利標名姓，仙山紀水程。回頭十萬里，舉目九重城。觀國之光未？中天日正明。”
- (15) (明)李贄：《焚書》（下），中華書局1974年，頁91-92〈與大人書〉。
- (17) George H. Dunne, S.J.,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Indiana, 1962, p.59.
- (19)(32)(35)(37)(38) (意)利瑪竇：《利瑪竇書信集》（下冊），台灣光啟出版社，1987年中譯本，頁258；頁257；頁259；頁256-257；頁257。
- (28) (清)姜紹書：《無聲詩史》，《西域畫》，《續修四庫全書》子部藝術類1065，上海古籍出版2002年，頁578。